

西部地域
文化心态与
民族审美精神

李天道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部地域

文化心态与

民族审美精神

李天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地域文化心态与民族审美精神 / 李天道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04-9291-7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民族文化—审美分析—西北地区②民族文化—审美分析—西南地区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7870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3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西部民族审美精神与当代多元文化建设	(1)
一 地域文化心态与审美意识	(1)
二 地域文化传统与文艺审美特色	(8)
三 审美文化发展与差异运动	(10)
四 差异发展运动与文化交融	(15)
五 西部审美精神的区域特色	(20)
六 西部审美精神的突出表征	(23)
七 西部审美精神的多元体现	(27)

西 北 篇

第一章 西北审美精神独特的区域背景	(35)
一 西北审美文化的历史构成及其当代转型	(35)
二 西北民族文化及其地域审美元素	(50)
第二章 西北民族文化的组成与审美特征	(57)
一 西北民族文化的历史组成与轨迹	(58)
二 西北民族审美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历史认同	(75)
三 西北民族审美文化区域特点及其多元格局	(78)
四 西北审美文化的多样特性及其现代价值	(82)
五 西北民族审美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互动重构	(104)
第三章 西北审美文化及其精神的多样呈现 (上)	(125)
一 民族神话的审美精神	(126)

二	民族史诗的审美精神	(148)
第四章	西北审美文化及其精神的多样呈现 (中)	(161)
一	民歌的审美精神	(161)
二	“花儿”的审美精神	(173)
第五章	西北审美文化及其精神的多样呈现 (下)	(190)
一	民族文学的审美精神	(190)
二	当代西北文学的审美精神	(198)
三	西北审美精神与民族的凝聚力	(202)

西南篇

第六章	多元共存的巴蜀文化审美精神	(219)
一	冲决、大胆进取	(220)
二	重生、活力四溅	(227)
三	自由、热情四溅	(241)
四	古老、深邃神秘	(247)
第七章	地域文化与巴蜀文化审美精神	(254)
一	西南地域文化与审美意识、艺术精神	(254)
二	中华地域文化与巴蜀审美精神	(264)
三	巴蜀地域的文化特征	(280)
第八章	巴蜀文化与审美精神的生成	(292)
一	巴蜀地域文化与人文品格	(293)
二	巴蜀地域审美精神与文化心态	(295)
三	巴蜀文学成就与文化气息	(310)
四	巴蜀文学审美精神对地域文化的影响	(313)
参考文献		(319)
后记		(328)

导 论

西部民族审美精神与当代 多元文化建设

中国文化具有某种同一性,但民族与地域特性的悬殊,又使之具有民族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从而形成区域文化心态与性格的差异。抓住民族与区域生存状态以及由此所生成的文化心态与性格差异性这一枢机,不但可以厘清民族与地域美学精神相互区别的特质,而且以此为轴心辐射开来,可以打通其与新世纪人文思潮,与当代中国现实,以及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诸多关系。当前的美学研究决不应只是一个空壳,决不应只是满足于体现当下的审美诉求与美学精神之交融与流动,决不应停留在现象学所谓“回到事物本身”,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脊骨和人文基础、精神旨归和终极关怀。

一 地域文化心态与审美意识

所谓文化心态是指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教育、人生观、价值观和现代观念及现代科技融合而成的整体心理趋势,是一个民族、一个阶层的人们在某一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存在的感知和认同,并由此表现为以感情、风俗、习惯乃至道德观念、审美意识、审美诉求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倾向。而文化性格则是指由一定文化决定的人类群体或个体的心理特征。它由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积淀而成。一个国家的文化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往往会深深烙上时代的印痕。而今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情势下,中国一定要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化性格。中国文化性格显然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存续、屹立不倒的精神。应该说,文化性格是一种比喻,是一种文化的价值观与审美诉求的综合。它穿越了历史,融入每一个人的血

液，凝于每一个人的心灵，沉淀和落实，腾起和升华，成为一种群体的无意识。“性格”作为一个生动化的比喻，其内核是重塑中华文化多年来在演变中不断沉淀和坚持的核心价值观，文化性格是存在的，是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给予极大的努力加以重新发现，重新反思，重新塑造的。审美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审美的生存，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审美精神不仅是人类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而且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它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与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民族经济形态以及其他生存环境相适应，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许多相异的特殊性质，展示着各自文化的民族人文品格。差异文化，是孕育、生成其美学思想并熔铸其审美精神的土壤。不同地域文化的美学思想各有自己的审美精神和审美范式、审美特色、审美诉求，因此，研究中国西部地域文化心态及其审美精神，需要深入探讨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性，由文化差异性到审美文化生成演化的整体结构，再到源流趋向，即审美文化的具体问题。

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它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民俗传统、经济体制、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是某一地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制于地域环境和社会结构，其中，地域环境对人类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对地域文化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换句话说，文化又是人类适应地域环境的产物。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是一个地方的灵魂，它因丰富的蕴藏量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力地推动着地区社会的进步。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地域环境千差万别，文化各具特色。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同时，地域文化又是民族文化在特定区域的积累。民族文化与美学思

想包括审美意识、审美趣味、文化心态与审美精神，离不开民族的地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文化与美学差异现象，特别是审美意识上的差异是由地域文化包括历史的和自然的因素所造成的，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所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人之心与天地山川流通。发于声，见于辞，莫不系水土之风而属三光五岳之气。”（王应麟《诗地理考·序》）文化代表一定民族和地域的特点，呈现出其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是民族精神成果的总和。可以说，地域文化是构成全人类文化的基石。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互为区别的地域文化。中国文化有源有流、深厚深远、仪态万千，地域文化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南北地理、东西地貌以及由此生成的南北、东西文化是存在差异的。

的确，地域文化是生存于不同地域的民族在不同的人文与生态环境下创造的，表现出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以中西文化为例，在宇宙论方面，早期的西方哲人认为，宇宙是空间的存在，是可分的、孤立的、对立的；人也是孤立的个体的存在。由此而形成的实证分析哲学，则把宇宙间事物的存在都看成是独立的，人与自然万物是对立的，人要探索、认识并征服自然。因此，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便表现为对个体与自由的追求，并以实证分析的科学精神为文化异向。中国哲人则认为，宇宙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与社会都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万物同宇而异体”（《荀子·富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宇宙天地间的自然万物是丰富的、开放与活跃的，而不是单一的、保守和僵化的。单个的物不能孤立存在，单个的人不能独自生存。正如《淮南子·精神训》所指出的：“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宇宙间的自然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不断地运动、变化，同时又处于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之中，阴阳的交替，动静变化，万物的生灭，都必须“致中和”。只要遵循“中和”这种原则，才能使“天地位”，“万物育”，以构成宇宙自然和谐协调的秩序。“和”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一方面，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作为地域文化因素之一的自然已不再是原初的自然，而是历史的自然；历史从此也不是单一的历史，而是自然的历史。历史和自然的这种必然而然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人地关系”，即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上。换句话说，审美文化的差异与审美意识的

差异是由构成地域文化因素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生成于文化土壤中的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意识首先不是纯粹自然的,而是观念的,是从人的生命原初生成的,是“自我”或言生命的现在形态,是当下。即如德里达所指出的:“这是当下,或者毋宁说是活生生的现在在场。……是活生生的现在,是先验的生命的自我在场。”^①按照德里达的差异论观点,“自我”中包含着非自我,它的在场中包含着不在场。这种不可还原的非在场“有一种建构价值,与它相伴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在的非生命、非在场或非自我从属,是一种不可还原的非原初性”^②。这也就是说,“自我”在根本上就是相对的、差异的。“自我”不是统一的、一体的,而是差异的、开裂的。既然知识和世界都给予“自我”之上,而这种“自我”本身是差异的、开裂的,那么知识和世界当然不可能是统一的、一体的、封闭的,而只能是差异的、多元的、开放的。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生成于“地域文化场”或“地域文学场”的审美文化与审美意识,就是这种差异的、多元的、开放的一种表征。

审美文化与审美意识是多元的、有差异的、开放的。这种现象与地域环境的影响分不开。世界上第一个认为环境对人类气质会产生影响的人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他在《关于空气、水和地》中提出了这一看法:“(居住在酷热气候里的)人们比较北方人活泼些和健壮些,他们的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同时,热带所有的物产比寒冷的地方要好一些。……在这样温度里居住的人们,他们的心灵未受过生气蓬勃的刺激,身体也不遭受急剧的变化,自然而然的使人更为野蛮,性格更为激烈和不易驯服。因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迅速转变能焕发人们的精神,把他们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拯救出来。”^③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论述。《管子·水地》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莖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

① Jacques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a*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6.

② Ibid., pp. 6-7.

③ 转引自波德纳尔斯基《古代的地理学》,梁昭锡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6页。

《管子·地员》又说：“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孟子则把“经界”作为仁政之始。《礼记·王制》说得更明确：“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考工记》说：“橘逾淮而北为枳，鸕铸不逾济，貉逾坟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这就是说，气候、空气、山水等自然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性格气质、好恶情感和服饰饮食。后来，明代学者王士禛在论及关中与川中水土与人性之关系时亦曾指出，关中土厚水深，“故其人稟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川中则土厚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义，人性之稟多与水推移也”（《广志绎》卷四）。至于从地域文化来解释具体的文化差异现象，就更为常见。如唐代赵耶利就曾用地理环境的不同解释川派与吴派琴乐风格的差异，他说：“吴声清婉，如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土之风。蜀声躁急，如急浪奔雷，亦一时之俊杰。”（朱长文《琴史》卷4）现代琴家徐立荪也说：“音由心生，心随环境而别。北方气候凛冽，崇山峻岭，燕赵多慷慨之士；发为语言，亦爽直可喜。南方气候和煦，山水清嘉，人文温雅，发为音乐亦北刚而南柔也。古琴本为我国普通乐器，历代知音者多有曲操流传，初无所谓派也。既因气候习尚，所得乎天者不同，各相流衍而成派，乃势所必然。”（《论琴派》）可见，从自然环境考察文化，在中国也有一个极为深远的传统。并且，比希波克拉底分析得更为深入，如《王制》还谈到了人们的生产工具和衣食住行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当然必须指出，鉴于当时生理学的不成熟，希波克拉底对气候和季节变换对于人类肉体 and 心灵影响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从原则上看，希波克拉底却开拓了一条重要的认识途径，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和上古末期的一些研究者，而且有近代人物如波当和孟德斯鸠，都承袭着希波克拉底的见解，其中以孟德斯鸠的影响为最大。

孟德斯鸠（1689—1755）曾到北欧和南欧进行过实地考察，他从反宗教神学出发，站在启蒙思想家的立场，对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作了肯定。他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纬度的高低、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启蒙思想家、法国大革命的

思想先驱，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史达尔“自然环境决定文学风格”^①的观点和丹纳“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原则”^②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历史的起点和动力的研究中，也表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据统计，在将近20年的文稿中，普列汉诺夫有15次之多阐述其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他在1893年底完成的《唯物主义史论丛》中指出：“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生产资料则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

普列汉诺夫虽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但他犯了一个类似费尔巴哈的错误：忽略了人地关系中的中介。也就是说，他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能动关系。普列汉诺夫“之所以认定人类历史的初始点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为自然地理环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实践、对生产活动的本质和作用作了片面的、非科学的理解”^③。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还赶不上黑格尔。黑格尔一方面认为地理环境与“生长在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以他的辩证法眼光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计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不能单独产生荷马。”^④

真正对人地关系及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进行科学分析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恩是把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人的对象和条件纳入人的实践范围来考察的，从创作者与客体的结合、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变换规律和精神生产现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时，特意加了一条注解：“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

① 史达尔：《论文学》，《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②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页。

③ 徐咏祥：《论导致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的理论根源》，《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④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人体、需要、劳动。”这说明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自然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同一著作中，马恩又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别、人类自然需要，特别是人类审美需要的差异时，都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给予高度的重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作用是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他说：“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些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②这里，恩格斯肯定了“自然条件”的差异与人类文明进程的不同有很大关系。

从上引材料和马恩一贯的观点来看，马恩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

展之关系的分析，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承认和重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

发展中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是通过地理环境对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来发挥的。地理环境这种影响既通过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表现在推进或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方面，也通过对人们心理气质和性格特征的某种制约表现在审美意识的差异上。但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是随着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逐渐减弱的。“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0页。

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①再就是把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生产的对象来看待，即把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作为艺术的对象，把它们看成“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②。前一个方面揭示了审美创作者心理结构差异的根源，后一个方面揭示了审美对象形态差异的根源，二者构成了文化心态与审美意识的差异。我们所说的审美文化差异的历史因素和自然因素正是就这个意义而言的。

所谓地域文化特征，是指人类活动与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等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影响下人类行为的表现方式，包括特定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居室、服饰、食物、生活习俗、性格、信仰、观念、价值等。

地域文化不同于自然地理环境。也就是说，它已具备了促使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人们审美意识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种种因素，比如政治、经济、风俗、性格、信仰等。在这些因素中，生产力的制约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程度与生产力的高低成反比。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对气候、土壤、河流、湖泽、森林的依赖就越多。而“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开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因而妨碍人的发展”^③。人的劳动创造性和自然属性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施展机会和磨炼实践，审美需要和审美能力也因此得到发展，创造出反映特定地域文化精神的艺术作品。

二 地域文化传统与文艺审美特色

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地域”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意义。因此，所谓地域文化，必须具有相对明确与稳定的文化形态。这就涉及地域文化的时间和传统。因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7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8页。

任何一种形态都是在一定时间段中积累的结果，文化形态则更是如此，所以没有传统，也就不可能有相对明确和稳定的文化形态。并且“地域”又是立体的，其表层是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一类的东西，其深层则是风俗礼仪、典章制度、性情禀赋等，最深处才是文化心理、集体无意识和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审美意趣等。各个层面相辅相成，互为关联，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共同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影响并规定着人的传统审美意识和文化心态。此外，“地域文化”还有可比性、对照性，有一个可资比较、对照的参照物。正因为此，“地域文化”的特征才有可能彰显。

文艺审美创作与地域文化传统关系密切，从一定程度上看，文艺审美创作的发展与地域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由早期多元分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多种文化因素，经过较长时间的相互吸取和综合发展，逐步凝聚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的文化结构整体。根据现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和多数学者的一致看法，我国古代史前曾经存在着三大比较强大的民族集团，即河洛地区的华夏民族集团、海岱地区的东夷民族集团和江汉地区的苗蛮民族集团，这三个民族集团所在地区的民族文化共同组合形成了多源头、多根系的汉文化。到了先秦时期，这种初具规模的汉文化又发展派生为邹鲁、秦蜀、荆楚、三晋、燕齐、吴越等不同地域的区域文化。在区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热潮的激荡磨炼，继而又出现了诸如阴阳、儒、道、墨、法、名、兵等众多不同的思想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文化高涨时期，它为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地域文化传统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的。时间和空间是地域文化传统两种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即地理之骨相。读历史如忽略地理，便失去其中许多精彩的真实的意义。”^① 地域文化发达与否，与地区经济有关。但经济对文艺审美创作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在富庶的经济和繁荣的文艺审美创作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即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分私学和官学两种。官学到处都有，私学则以经济发达地区为多。以两汉时期为例。当时经济最发达地区在关中、中原和齐鲁三地，当时的

① 王恢：《中国历史地理·编著大意》，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

私学教育也以这三地最为兴盛。自宋代开始,中国的私学教育发生重大变化,即书院教育的蓬勃兴起。宋代及以后的元、明、清各代,中国的经济重心稳定在南方,中国书院也以南方为最多。一个地方的官私教育发达,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刻书、藏书事业也随之发达,为文人与审美文化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经济发达的区域不仅官私学校发达,图书事业兴旺,而且交通方便。这里的文艺审美创作人才除了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外,还有条件外出漫游。这一点对文艺审美创作家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文艺审美创作家,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很少。他们并不以文艺审美创作为专业,做官才是本行。孟浩然、顾炎武以及后期的陶渊明不做官,但他们都有田庄,都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所以所谓的“诗穷而后工”这个“穷”字,是“穷通”的“穷”,是指政治上的不得志,不显达,不是指经济上的贫寒。在中国古代,士人人生的目的不外两点:一是求生存,一是求发展。读书、交游、写作,都是求发展的行为,只有生存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发展的事。真正的穷人连饭都吃不饱,还有什么审美活动,还存在什么审美文化与审美精神呢?

文明程度高的区域对文艺审美创作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谓文明程度高的区域,是指那些文化传统悠久、文化根基深厚的地区。其区域文化传统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旦形成,就有相当的稳定性,不会因政治、经济等外在条件的改变而立刻改变。它们即便不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之所在,只要不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仍然可以开放出灿烂的现实文明之花。文明程度高的区域文化传统是文艺审美创作及其审美诉求、审美价值取向与审美精神生成的一个渊藪。

三 审美文化发展与差异运动

文化特殊性与差异性的形成与一定的地域环境分不开。地域环境是文化赖以形成的基础。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地势、水文、气候等自然生活条件对文化间差异性的形成往往有着多种影响。中华文化形成于中华大地,这里地域辽阔,空间地理环境优越,四周都有天然限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这种独特地理单元的构成对于中华文化一体性的形成也有着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各文化,尽管也有分裂的时候,但统一始终

占据主流,由此我国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多文化国家。具体来说,地理环境不但对中华文化的一体性有着影响,而且对它多元性的构成也起了重大作用。我国东西南北间跨度都很大,地形地势非常复杂,自然地理等条件相差十分悬殊,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自然便有了重大差异。人们习俗的差异必然会造成文化及其审美意趣与美学精神的差异。同时,审美意趣与美学精神的差异与认同运动又是地域文化及其审美意识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但是综观目前关于审美意趣、审美诉求与美学精神差异与认同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只以同一性的视角对审美诉求与美学精神认同的概念及其表征形式进行辨析,对西方的审美意识认同进行介绍、分析和论证,对一些关注审美意趣、审美诉求与美学精神认同问题的审美意识认同理念进行评价,而忽视了与同一性相对应的差异性及其形成根源的文化发展史视角。在文化发展史看来,正如万紫千红才是春,成千上万的物种才能构成生机勃勃的生物圈的哲理一样,只有承认文化差异性或多样性的审美意趣、审美诉求与美学精神比较观念才会让文化比较审美意识与美学精神的内涵和特性变得丰富、多彩。文化的发展并非单因单果,它每前进一步,必会牵动民族与地域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和整个民族与地域生存的方方面面,于是一种更深广的反思便开始了。它围绕着如何重新认识文化自身,认识民族与地域和文化历史的现状,重铸民族文化灵魂的道路而展开。这一思考重心的迁移,归根结底,就是思索我们的文化生存状态。中国文化及审美意趣、审美诉求和美学精神与西方思潮具有某种同一性,但由于地域特性的悬殊,它又具有“差异性”。

当代对于文化的差异与同一、同质问题的研究应该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最为深入。20世纪末以来,以德里达解构理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从东方人的角度第一次空前彻底地清理了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各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全方位地拆解了西方传统的文化思想,彻底摧毁了旧的文化系统,将西方文化导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后现代主义时代。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不仅开辟了文化哲学思想的新纪元,而且也开辟了美学研究的新纪元。解构理论的思想观念和策略深深触及并改变了新一代批评家们的批评理念和方式,他们以之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解读不同文化所生成的审美意识、审美意趣、审美诉求与美学精神及其话语文本,创立了各种类型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批评理念和方式,为各路后现代主义批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解构主义理论看来,作为人类精神的体现,文化与审美意识、审美意趣、审美诉求与美学精神不是基于唯一的因素之上的,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基于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运动之上的,是有差异的、多元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德里达的“延异”观念中获得学理依据。

“延异”是德里达在改造和发挥索绪尔的关键词“差异”的基础上生成的。索绪尔的“差异”原是一个描述语言符号的性质和状态的词语。他提出语言的核心因素是符号,符号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意义的层面,如观念、概念等;二是指示的层面,如声音、形象等。索绪尔将前者称作所指,将后者称作能指。传统中人们普遍认为,观念和概念源自事物的客观属性,声音、形象源自观念、概念。索绪尔的看法正好相反,意义所指不是源自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源自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间的差异关系,能指符号也不是由概念所指决定的,而是源自一种符号与另一符号的差异关系。意义所指源自符号间的差异关系,符号的能指也不例外。德里达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理论的精细解读和彻底反思中深刻体察到:世界不是基于某个统一的原点之上的,而是基于事物与事物间的差异关系之上的,不是统一的、一元的,而是有差异的、多元的。为了充分阐发他的这种差异论思想,德里达不仅在其力作《言语与现象》中从反面质疑、反驳了胡塞尔的“自我”中心论观念,而且从正面阐发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延异”。

德里达借鉴索绪尔的“差异”原则,提出“延异”说,承认差异性,强调他性,并力图弘扬作为他者的因素。他在《哲学的边缘》中表示:“哲学始终就是由这一点构成的:思考它的他者。”^①这里也表明德里达主要致力于探讨为逻各斯中心论全面渗透的哲学史中的“同一”与“他者”关系。在他那里,“延异”这个“非概念的概念”、“非语词的语词”对于理解他有关“他者”问题的思考至为重要。“延异”其实是“差异”一词的“延误”和“区分”两个含义的充分展开,而关于“他者”和“他性”的思考则推动了德里达解构理论后一个含义的游戏性“播撒”。区分意味着“不同,他者,不能辨别”,与“争论”,“他性”,“距离”,“间隔”^②相关。在此基础上,“延异”又开启了德里达解构理论的一种

① 雅克·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芝加哥,1972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8页。